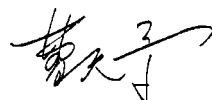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紀評論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

走向社會民主主義？

——簡評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轉型



中國共產黨換旗是指它從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革命政黨，轉換成一個以社會民主主義為指導思想和施政綱領的改良主義政黨。這直接牽涉到中共當前執政的合法性。

近年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換旗議論紛紛。一個政黨換旗，指的是它更換其官方意識形態。就中共而言，這裏指的是它要從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革命政黨，轉換成一個以社會民主主義為指導思想和施政綱領的改良主義政黨。這不僅牽涉到中共要更換其存在的階級基礎、更換維持其繼續存在的內部的和道義上的凝聚力，而且更直接牽涉到中共當前執政的合法性。對於這樣一個嚴重的事態發展，議論紛紛，當然可以理解。鼓吹者引經據典，稱其為不可避免、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疑懼者驚訝不已，只覺得不可思議；反對者據理力爭，力圖挽狂瀾於既倒。

顯然，離開了三十年來中國發生的急劇變動，就不可能準確地把握這一發展。本文將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此變局作些評論。為此，先對中共換旗的主要內容作一概述；在簡單回顧了換旗的歷史根由與國際背景之後，將着重討論其引人之處與實際含義；最後以評估抵制中共換旗的可能性結束本文。

一 換旗

換旗的主要鼓吹者之一謝韜明確主張，中共應該與第三國際的暴力社會主義傳統徹底決裂，以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和旗幟，規範中國的改革實踐。他進一步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原則上不可能通過革命，而

只能通過資本主義在社會民主主義框架中的高度發展，才能實現。在謝韜看來，社會民主主義代表了工人、全社會和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它的目標是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調節分配、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城鄉、體力與腦力），從而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它根據普世（文明）價值（私有財產、個性、人權、自由、理性、民主等等）的要求，實行憲政民主，建立福利國家，實現階級妥協、階級合作，從而通過和平漸進、非暴力的途徑，過渡到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①。

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中共十七大高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只是謝韜等換旗派所要求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退化版。

在經濟方面，正如中共換旗的另一位主要鼓吹者丁寧寧指出的那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的「社會主義」，並非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不過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而已^②。應該指出，中共主導的市場經濟，在1990年代主要由新自由主義引導。只是在十六大以後，執政黨強調了社會公正，對政府行為缺乏規範、官員利用職權設租尋租、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等所造成的極度的社會不公有所抑制；而科學發展觀^③的提出，則又在理論上對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帶來的種種弊端有所匡正。正是這些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實行的新的指導方針，使中共主導的市場經濟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

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宣稱的核心價值體系裏，有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基石的人權、民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也有毫無實質內容的「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十七大報告內容）、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還有與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和諧文化和中華文化；當然，還有處於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而後者，據說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區別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兩個主要特徵之一。可是，這裏的「馬克思主義」，實際是其中國化後的最新版「馬克思主義」，是沒有階級分析、不反對資本主義、沒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只有發展生產力這一條的「馬克思主義」。試問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哪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會覺得不能接受？因此，在信念和價值觀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任何區別。

兩者真正有區別之處是在政治領域。換旗派作為體制外精英的政治代表，不滿意體制內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和滯留於新權威主義模式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對於他們來說，新權威主義模式，最多只能作為過渡階段或中間站。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來說，理想的政治模式當然是西方的憲政民主和三權分立；特別是在授權問題上，不應承認任何政黨特權，只有政治上平等的個人組成的政黨通過民主程序才能得到授權。由於「三個代表」理論為資本家入黨打開了大門，黨內認同這一模式的聲音逐漸增大。對於憲政民主，中共高層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名義，把它列為第一號禁區，不准討論，並以「依法執政」、「人事制度改革」、「任命黨外官員」、「政企分開」等一黨制框架內的操作性改革措施作為替代物，以慰人心。因此，在政治領域，中國特色社會主

中共高層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名義，把憲政民主列為第一號禁區，不准討論，並以「依法執政」、「人事制度改革」、「任命黨外官員」、「政企分開」等一黨制框架內的操作性改革措施作為替代物，以慰人心。

義雖然早已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但卻與換旗派要求的社會民主主義還有相當的距離。

二 歷史根由與國際背景

對於中共主流派換旗的歷史根由，我們可以試從價值目標的定向定位、社會經濟政策的因應演變和黨內話語權鬥爭的需要這三個視角作一把握。

第一，就價值定位而言，以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為主要批判目標的思想解放運動，堪稱中國當代史中的轉折點。以此為契機，中國的政治精英用現代化理論取代了革命和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和旗幟。先是打開局面的實幹，然後是一步步地在經濟、歷史、文化、政治等領域建立起現代化理論的話語霸權，最後則是換旗。

對毛澤東迷信的破除，第一個突破口是文革；接着是大躍進、廬山會議、反右和歷次政治運動；後來連三大改造似乎也搞早了，土改似乎也冒進了；到最後，毛時代唯一能夠留下來的正面政績，只剩下了「兩彈一星」。至於1949年革命的基本成就，即剝奪了剝削階級權力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強調平等、崇尚工農（為創造歷史的主人）的價值體系的確立，則很快就被鋪天蓋地的對於毛時代的種種罪行的批判所淹沒。

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們，對於文革及其理論基礎——階級鬥爭為綱——深惡痛絕，這可以理解。但這一情緒，在理論上帶來了一個當時微妙但後果嚴重的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那就是，階級分析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逐漸淡出，而「生產力論」則成了主要的理論視角。於是，社會主義被歸結為就是發展生產力；於是，人類歷史要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劃分為逐級上升的一系列階段；於是，中國被認定為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因而必須歡迎資本主義、歡迎資本家對生產力發展所作的貢獻；於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翻幾番（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外部指標）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主要根據；於是，發展和效率成了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題，如此等等。

在實際生活中，從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擺脫出來並轉向「四化」建設，在文革結束之初，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四化」，本來指的只是社會主義制度內技術層面的現代化，可是，由於特定的歷史語境，這一技術層面上的目標，卻引發了一場話語霸權的大轉移。這裏說的特定的歷史語境，指的主要是：（1）改革開放後與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觸；（2）思想解放運動打破了各種禁忌，引發了強烈的好奇心，從而使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基調的形形色色的經濟、社會、政治、歷史理論，包括現代化理論，被大量引入；（3）馬克思主義本身被簡化為「生產力論」。而這裏說的話語霸權大轉移，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失去了它的指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

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們，對於文革及其理論基礎（階級鬥爭為綱）深惡痛絕，這一情緒，在理論上帶來了一個當時微妙但後果嚴重的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那就是階級分析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逐漸淡出，而「生產力論」則成了主要的理論視角。

改革初期的「補課論」^④和後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其理論基礎就是這個「生產力論」。與「生產力論」密切相關的是歷史發展「階段論」。謝韜批評毛澤東「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便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⑤，這一批評的前提便是「階段論」。李銳則更為明確地說道：「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自然演進的結果。馬克思講過，只有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再不能發展了，生產關係才能改變。」^⑥

在政治上，比「生產力論」和「階段論」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該理論認定，初級階段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如果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剝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那就不能將其消滅。應當承認，中共當初提出「初級階段論」有其歷史意義。它用「階段論」的語言，否定了只要計劃的傳統觀念，論證了市場機制的必要性。可是，一旦認清了必須用市場來取代計劃，它的歷史任務便已經完成。繼續談論初級階段，有害無益，因為它蘊含着兩個錯誤的設定：第一，當社會處於初級階段，意味着不管甚麼(包括資本主義僱傭剝削在內)，只要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就可以容許、值得提倡、應該保護。最終換來的結果是只有初級階段，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成了放棄社會主義底線的藉口。第二，當社會到了高級階段，就可以不要市場經濟、只搞計劃經濟。但如果經濟生活的現實，表明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這就倒過來為初級階段的長期性甚至永恆性提供了「論證」，也就是說，為保存資本主義僱傭剝削提供了永遠不會過期的合法性。

實際上，從簡化版馬克思主義中演變出來的「生產力論」和「階段論」，也被195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以美國經驗為樣板的現代化學說取為理論支柱。這一學說本身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又直接為冷戰服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直接、間接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並大多為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所吸引，極大地改變了冷戰的戰略態勢。作為回應，美國的冷戰騎士，在美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提出了現代化理論，把經濟的起飛發展，以及一系列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指標的逐步實現，說成是人類進化的必由之路，並以之來與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模式相對抗，爭奪中間地帶^⑦。

蘇東劇變前後，中國和世界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者乃至一般左派，對自身的價值和目標開始重新定向與定位。這一過程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爭奪話語霸權的鬥爭；而鬥爭的焦點，則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現代性^⑧。

馬克思主義認為，基於科技工業大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巨大的進步，為人類解放提供了生產力的前提；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僱傭剝削和勞動異化，又必然引起矛盾衝突；只有通過革命，超越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真正實現人類解放。馬克思主義並不簡單地否定資本主義現代性(其基本特徵是面向未來、立足理性、追求解放)，只是認為它

作為二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回應，美國的冷戰騎士在美國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提出了現代化理論，把經濟的起飛發展，以及一系列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指標的逐步實現，說成是人類進化的必由之路。

必將被超越、為更高形式的現代性(即社會主義現代性)所取代。也就是說,社會主義也是面向未來、立足理性、追求解放的。只是在社會主義現代性中,個人解放將被集體解放(通過工人鬥爭、反殖鬥爭、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而實現的階級解放、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所取代,個人理性、工具理性得為集體理性、價值理性確定的目標服務。

但在現代化理論的話語體系中,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生產力、(私利計算的)個人理性和個人自由的直線擴展;而革命和社會主義,由於其「非理性」的對個人(財產)自由的約束^⑨,或者是對正常的現代化過程的偏離,遲早得回到現代化這一人類文明主流中來。革命和社會主義頂多是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某一階段(如完成民族整合、建立發展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民族國家,又如落後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可用工具,只要階段走完,目的達到,工具就該扔掉。蘇東劇變似乎最終印證了這一斷言。

那麼,到底甚麼是現代化呢?簡單說來,就是美國化。在1950年代,現代化指的是市場經濟、代議制民主和當時美國還奉為主臬的羅斯福新政(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式的福利社會。到了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已被實際上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所取代;現代化學說中的福利社會一項,也被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各領域的全面私有化所代替。這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並以全球化為其具體實現形式。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現代化理論在中共內部(實際上的)話語霸權地位的確立,對其觀察歷史、指導實踐、規劃未來時思路演變的定向作用,不容低估。

第二,就政策演變而言,從一黨制和「生產力論」出發,中共在文革後迅速啟動了在新權威主義—發展主義主導下,以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開放。這一政策在實施之初,因其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標榜,預設了社會公平;並在實踐中(至少在改革之初),確實做到了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得到了好處,因而得到了全社會的認可;儘管無產階級的階級目標,即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特別是實現不受剝削壓迫的社會平等、享受工作安全和作為企業、社會和國家主人翁的政治社會地位,已經從改革的社會目標中逐漸消失。

為了實現發展主義的目標,中共高層把注意力轉向效率。在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時,決策精英其實已經放棄社會公平以求發展效率。到了1990年代,在蘇東劇變後出現的強大的國際國內壓力下,中共的一些智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力圖用西方1980年代開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即可以概括為「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這些建議,由於其短期效益,加上國際思潮的影響,以及捲入全球化過程後不得不經受的國際資本和國際金融機構所施加的外部壓力,陸續得到了決策者的採納。

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確實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⑩。它不僅使國民生產總值(GNP)翻了幾番,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四億多的人口脫貧。可是,直接影響億萬群眾日常生活的醫改、教改、房改,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政策方針與有關部

蘇東劇變後,中共的一些智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力圖用西方1980年代開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即可以概括為「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指導中國的經濟改革,並陸續得到決策者的採納。

門官員的設租尋租行為的曖昧結合，市場經濟在為一些人開闢源源不斷的財源的同時，卻使一般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因而怨聲載道。更為嚴重的，當然是官商勾結，在優化資產結構、建立現代企業的名義下，瓜分國企資產，使原先以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存在的社會主義家底，迅速地轉換成資本家用以剝削勞動者的私有財產，同時把大批國企職工拋向街頭，使之淪為社會邊緣群體，引起社會動蕩。「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是企業和國家的主人翁」，完全成了一句空話。「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這一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的基本屬性，已經不復存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政治基礎，即共識和穩定，也已不復存在。與之密切相關的是，改革在全球化的剛性約束下走上的發展主義道路，已在生態、資源和環境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而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遇到了一系列瓶頸約束^①。

為了應對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下的改革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十六大後中共高層開始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並特別強調社會公正^②，企圖以此來緩和僱傭剝削必然帶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對抗，避免激烈的社會動蕩。

第三，換旗的直接動因，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實踐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承諾間的巨大鴻溝，所引起的對於黨內話語權的爭奪。換旗派認為，改革派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嚴格說來，這一說法並不準確。由於「不爭論」，改革派享有實際上的話語權，即有些人所謂的改革派的「兩個凡是」：(1)凡是改革的就是正確的；(2)凡是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只有通過(沿着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才能解決。對改革的種種非議雖然長期存在，但在「兩個凡是」的壓力下，基本上處於半非法、半地下的狀態，並沒有真正的话語權。不過，這一說法空穴來風，非無因由。只要執政黨不正式地、公開地放棄原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承諾，以這種承諾出發對改革中出現的消極方面、對現有改革方向的正當性，甚至對推行改革的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提出的非議，總是具有某種話語上的合法性。特別是當改革遇到嚴重挫折、弱勢群體的不滿迅速增長時，這種非議顯然會挑戰現有的改革方向，並威脅到改革派的執政權。

出路何在？或者說，怎樣才能徹底取消挑戰派潛在的話語權？簡單地重複「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並不足以回應對黨內話語權的挑戰，因為挑戰的基本依據，本來就是現有的改革模式和發展模式所造成的問題。要恰當地回應這一挑戰，改革派必須提出新的模式來規範未來的改革。換旗派認為，出路只能是公開換旗、正式轉向社會民主主義。

至於中共換旗的國際背景，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意識形態。蘇東劇變和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垮台，使馬克思主義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並處於困難的調整階段。與此相對照，當前的資本主義卻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倫理—政治領域中的保守派自由主義、經濟領域中的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國際關係中的新帝國主義、文化領域中的快樂主義，等等)，並在與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鬥爭中節節取勝(在中國則主要通過對文革、大躍進和國企低效的壟斷解讀而

簡單地重複「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並不足以回應對黨內話語權的挑戰。要恰當地回應這一挑戰，改革派必須提出新的模式來規範未來的改革。換旗派認為，出路只能是公開換旗、正式轉向社會民主主義。

取勝)，從而在急劇變化的當代世界起着強有力的導引作用：通過人權、理性、效率、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發展主義、消費主義等口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全方位地把各國整合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去。

其次，這一意識形態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從1980年代起，有關資本主義的種種討論發展成為全球的熱門話題，而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卻不再有人提起。但這並不等於「革命與解放」就此從地球上消失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不管是用軍事手段進行的政權更迭，還是通過顏色革命來推翻社會主義政權，一直在不停頓地進行着，其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專制暴政中解放出來。這場正在不停頓地進行着的革命，其最終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完成現代化，即把資本主義核心地區以外的部分納入依附性的現代化軌道，在國際分工的名義下，以結構性的不平等的形式，對這些地區實行新殖民主義的剝奪，並用現代化的話語來改寫殖民主義的歷史，以建立起資本帝國主義歷史一貫的道義正當性。

再者，經濟全球化對中共主導的改革所施加的結構性約束。中國改革的重要一環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開放。在引進外資、出口導向、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導引下，中國經濟日益加速地捲入全球化的進程，被迅速地整合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淪為跨國資本的附庸，成為外資控制下的、為發達國家製造廉價消費品的加工工場乃至血汗工廠。在這種情況下，「與(資本主義世界)國際接軌」，經由買辦官僚權勢集團的中介，成為不可違背也無法抗拒的剛性約束，專橫地制約着中國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乃至政治轉型。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邏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迅速地展示出了它們的全部力量。階級、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和階級對抗的重新出現乃至惡形發展，只是這種邏輯的自然結果而已。而換旗，不過是在階級對抗急劇惡化的形勢下，中共力圖控制局面的一種努力而已。

沒有政治(民主)、社會(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和經濟(巨額海外利潤)條件的完美配合，社會民主主義不可能有所成就。而這些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存在，這也就是為甚麼社會民主主義在這些國家，只是不能充飢的畫餅。

三 社會民主主義的引人之處與實際含義

社會民主主義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其對再分配的公正承諾和實施。但是，人們往往不去注意使這種承諾得以兌現的社會歷史條件。首先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經濟和比較完善的議會民主制度，這是人數眾多並且高度集中的工人組織起來、建立強大的工會組織，甚至工人階級政黨進行合法鬥爭的基本前提。其次是通過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巨額海外利潤，這是西歐資本主義通過其掌握的國家機器購買社會安定的經濟前提，其主要形式和最高成就是福利國家的建立，具體表現為政府主持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沒有這些政治(民主)、社會(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進行的階級鬥爭)和經濟

(巨額海外利潤)條件的完美配合，社會民主主義不可能有所成就。但這些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存在，這也就是為甚麼社會民主主義在這些國家，只是不能充飢的畫餅。

不應忘記的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框架裏，社會公平是通過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來實現的。在初次分配時，工人只拿工資，資本家全部利潤歸己。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階級利益怎麼可能不產生對抗？有階級利益的對抗就會有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同時，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是自由主義。在政治法律上，這就表現為：對國家權力和公共權力，法律會有各種有效的約束和控制；而對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私人權力，卻是毫無約束可言，全憑當事人的博弈。在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裏，勞資合作^③之所以能夠搞得比較好、比較成功，其前提是西歐的工人建立了強大的工會，與資本家進行長期、有效的階級鬥爭。而空談以市民社會來取代權威統治、以社會民主主義來取代斯大林主義的東歐書生，面對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財產權力)的資本家，在博弈時無牌可打，最後得到的只能是最糟糕的資本主義待遇。

對於換旗派和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最為誘人之處也許是其中的憲政民主。這裏的一個背景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在民主問題上的缺失。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革命勝利(即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後的政治統治形式，沒有系統的論述。他們既提到過「爭得政治民主」，也強調過「無產階級專政」，但都沒有深入展開論述。不過，有兩點基本思想還是很清楚。第一，作為暴力革命思想的延伸，取得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於不甘失敗、繼續反抗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必須予以鎮壓；第二，在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內部實行民主。

作為基本原則，上述兩點思想似乎不錯，但要用以指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實踐，卻又顯然不夠。內部民主怎麼實現？對敵鎮壓怎樣進行？特別是應該怎樣對待廣大的中間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對於這些極為重要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涉及。究其原因，除了缺乏實踐上的緊迫性和缺乏歷史經驗以外，還與他們以下兩個並不正確的預設有關係：(1)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階級關係的極大簡化，除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以外，中間階級即使還存在，也已無足輕重了；(2)隨着資產階級的消滅，國家也會很快消亡；國家機器履行的將會是經濟職能而不再是政治職能。

可是，複雜的階級關係在革命後社會中的長期存在，使得國家消亡的思想失去了實際意義。在政治生活中，對於上述重要問題的處理，如果沒有法律制度加以明確的規定、不採取一定的形式、沒有應該遵循的程序，勢必帶有極大的任意性，並為政權本身的異化(權力的濫用和新型的剝削壓迫集團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毛澤東對國家機器的異化(「變修」)有所認識，並提出兩類矛盾學說和反修防修理論以求匡正。但他同時又完全繼承了列寧和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中對法制

換旗派提出實行憲政民主，直接挑戰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在當前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與一般群眾的期望和要求不無平行之處。據網上統計，全國人民關心的首要問題就是對權力異化的監督制約。

形式和程序的蔑視、拒絕和踐踏，並補充以他本人特有的、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對群眾暴力的偏愛、鼓吹和濫用，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以「大民主」理論形式出現的暴力專政理論。實踐上，他極度誇大階級矛盾，擴大階級鬥爭，並力圖動用群眾暴力來防止、糾正國家機器的異化（「反修防修」）。其結果是，在一段時間內，群眾暴力與國家暴力在全國範圍內的交替使用、結合使用和毫無節制的濫用，使得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比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還要血腥和殘暴。

長期生活在血腥而殘暴的毛式政治運動中的人們，對憲政民主自然是憧憬嚮往有加。值得指出的是，換旗派提出實行憲政民主，直接挑戰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在當前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與一般群眾的期望和要求，不無平行之處。據目前網上的統計，全國人民關心的首要問題就是對權力異化的監督制約^④。監督制約，說到最後，就是要追溯權力的來源問題，或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合法性問題：為甚麼你有執政的壟斷權呢？網民的這一關注，表達的是對實行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的深切期望和強烈要求。

不過，有了憲政並不等於就有了民主。憲政只是從形式和程序上，制約政府的權力、消除任意施政（專制）的可能，確保公平，保障個人的自由權利。唯法主義者的根本錯誤在於，他們完全不注意憲政的內容，即保護甚麼、不保護甚麼。保護私有財產、契約自由、僱傭剝削自由的自由主義憲政，和保護勞動產權，保護公民的工作權、福利權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憲政，其內容和所奠基的社會的性質，自是南轅北轍。

更為重要的當然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沒有民主，憲政能有多大意義？但甚麼是民主？民主的本意是人民主權，即凡事人民說了算。但誰是人民？官員、企業家，還是藍領、農民工？在當前的市場經濟社會裏，誰享有主權？誰說了算？行使民主權利的基本前提，即享有教育權、知情權、話語權，甚至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都得有經濟實力作後盾。任何憲政，如果不能確保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人口的絕大部分或人民的主體）行使民主權利的經濟前提，那麼不管精英們把話說得多好聽，都只是騙人的鬼話；把條文訂得多細緻、多嚴謹，都只是一紙騙人的空文，怎麼能確保人民有行使其主權的能力呢？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主得靠自己爭取而來，而不可能來自別人的恩施。加拿大民主福利國家的設計師、哈佛大學訓練出來的政治經濟學家金（W. L. MacKenzie King），在鼓吹提倡福利民主和普選權前，曾受僱於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協助解決1914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小鎮拉德洛（Ludlow）由煤礦工人罷工引起的政治危機。工人鬥爭的堅決，迫使他認識到，只有實行普選民主、建設福利社會，才有可能弱化工人階級的動員和鬥爭，確保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平。為甚麼在中國廣東的血汗工廠裏，既沒有福利，更沒有民主？道理很簡單——那裏的工人沒有（也被禁止）組織起來與資本家進行鬥爭。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吸引人，據說還因為它符合人性的根本願望，體現了諸如私有產權、個性、人權、自由、自決、理性、容忍、民主等普世的文明價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吸引人，還因為它符合人性的根本願望，體現了諸如私有產權、個性、人權、自由、理性、民主等普世的文明價值。可是這些普世價值其實並不普世，只不過是當代西歐北美局部地區近世以來流行的價值觀念而已。

值。可是問題在於，這些普世價值其實並不普世，只不過是當代西歐北美局部地區近世以來流行的價值觀念而已。其次，普世價值之間經常起衝突。起了衝突怎麼辦？誰來裁判？比如說言論自由和不讓種族歧視出現，都是當代歐美流行的普世價值。要是有人要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能給這個自由嗎？所以，價值的背後是權利，權利的背後是利益。普世價值只不過是給局部的、一時的世俗利益披上的一襲神聖外套而已。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勞動者擺脫了剝削和壓迫，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運。正像君主立憲體制內君主開明了不等於實行了共和制一樣，社會民主主義體制內的資本，受到民主權力的節制，並不就是社會主義。從根本上來說，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為工人利益而鬥爭的一種改良運動；它沒有觸動、更沒有挑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它所取得的成就，本質上只是資產階級對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的某種讓步。因此，一旦由於某種原因，工人階級的人數有所減少，組織性、戰鬥性有所削弱，或海外利潤出了問題，資產階級就會立即企圖收回讓步。一個眼前的例子是：1979年英國的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和1980年美國的列根 (Ronald W. Reagan) 先後上台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內向福利國家頻頻開刀的新自由主義，迅速取代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主導政策主流的基本綱領，嚴重地侵蝕着福利國家的根基。1990年代以降，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日益衰落，是個不爭的事實，原因十分簡單——經濟全球化使得競爭日益激烈和殘酷，當對手因採用英美模式、頻頻向福利制度開刀而取得競爭優勢時，逼着你向野蠻壓榨工人的底線看齊的壓力便很難抗拒。目前，歐洲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國家，如法國和德國，也包括瑞典在內，雖然由於政治傳統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對英美模式仍然有所抗拒，但當今世界的主流，絕對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漸衰落的瑞典模式。

那麼，換旗，或把社會主義換成社會民主主義，即把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度作為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或經濟基礎，並對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作相應的調整，實行憲政民主、建立福利國家，在當前的中國意味着甚麼呢？那只能意味着放棄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接受重新出現的資產階級的剝削和控制。至於能否從資產階級那裏取得一些讓步，從未來的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中得到一些補償，那得一看資本家的好意，二看自己的鬥爭能力了。更現實一點來看，倡導社會民主主義，在當前中國的語境下，導致的只能是新自由主義。而用新自由主義來主導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就算成功了，其結果也只能是殖民地性質的現代社會：耗盡資源、摧毀環境的發展主義、為發達國家生產廉價消費品的加工工場，以及充滿階級對抗和兩極分化的動蕩社會。

因此，從根本上說來，中共換旗表達的只是在三十年急劇的社會變動中新生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這種訴求居然成功地得到表達，明白無誤地表明了這一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能量已經強大到足以影響中共走向的地步。

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社會民主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框架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和運動，而民主社會主義卻是在實現高度人民民主的條件下，超越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概念框架和制度框架。

四 社會民主主義：中國別無選擇嗎？

不少人，尤其是換旗派，往往把社會民主主義混同於民主社會主義。其實，嚴格說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社會民主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僱傭勞動制）框架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和運動，而民主社會主義卻是在實現高度人民民主的條件下，超越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概念框架和制度框架。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力成為商品；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合謀下，勞動者淪為僱傭奴隸，成為資本榨取利潤的工具。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結構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是勞動異化、人性異化、社會不公正和社會罪惡的根源，也是社會對抗、社會改良，乃至社會革命的根源。緩解矛盾、轉嫁危機主要靠資本擴張：內在的技術性擴張（新生產領域和新經濟領域的開發）和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對外擴張（殖民主義或全球化）。但資本擴張的結果，只能是同樣的結構性矛盾在所有經濟—技術領域內和全球範圍內的複製。因此，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解決，要求廢除僱傭勞動制度、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使勞動者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也就是說，要求超越社會民主主義的制度框架。

而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定向，卻是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實現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即建立一個經濟上消滅剝削、社會政治生活中消滅特權和壓迫、人人平等的社會。為了這一理想，民主社會主義者首先要求實現憲政民主。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異化的一般理論，任何精英權力都有異化變質、離開社會主義方向、變成新的剝削壓迫權力的可能。因此，實行憲政民主、對精英權力監督制約，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根本目標，是實現政治權力（從精英黨手裏）回歸社會所有；而否認異化的可能^⑥、拒絕憲政民主的任何主義，絕對不是民主社會主義。

憲政民主究竟是甚麼？換旗派認為憲政民主就是人權、民權、產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制度體現。但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憲政民主具有階級內容；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與資本主義（包括社會民主主義）的憲政民主，在立憲主體、倫理基礎和指導原則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實質性區別。

首先，民主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其目標是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它的出發點既不能是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因為這將立即導致對社會主義原則的根本否定）；也不能是籠統的民族主義或全民利益（因為通過發展主義而實現的民族復興和社會福利的整體增長，往往會掩蓋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與社會主義原則南轅北轍）；而是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因此，社會主義憲政要處理的頭等要務，就絕不是自由主義者念念不忘的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自由；而是處理階級關係（即解決國體問題）——確認工農大眾的國家主人地位，確保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成果，即剝奪了剝削者壓迫、剝削勞動者的權力，在任何情況下不致喪失。

換旗派認為憲政民主就是人權、民權、產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制度體現。但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憲政民主具有階級內容；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在立憲主體、倫理基礎和指導原則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實質性區別。

其次，誰來立憲？誰是立憲的主體？當然應該是工農大眾，而不是財富精英和權力精英。人民大眾必須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成為立憲過程的主體。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憲法確實代表工農利益，而不是在任何藉口或名義下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

最後，立憲的基本原則，是取消精英特權、確保公民在享有各項權利(如自由、收入、財富、機會和權力)時的平等地位。這既是社會公平的倫理基礎，也是民主授權的法理基礎。否定了精英特權，一切公眾權力(包括共產黨的執政權)的源泉，只能是公眾本身。任何公眾權力，只有得到公眾通過民主程序的授權，才有合法性。

為了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必須吸取資本主義已經取得的成果，建設比之效率更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固然有市場失靈和外部性等種種問題，需要國家調控指導；但作為處理供需信息、配置資源的一種機制，其本身大體上說來卻是價值中性的。當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時，市場成了資本主義僱傭勞動制的一個核心環節。但如果勞動力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與資本平等的主體進入市場，那市場就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市場競爭，是經濟生活中活力和動力的源泉。儘管優勝劣汰會造成分化，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存在剝削，因而分化程度不會太嚴重；同時政府還可以採取措施，對分化的消極方面作適當處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分配扣除了成本(工資和其他要素的消耗)後的剩餘、利潤或增量產權時，勞動者作為要素之一，享有與資本平等的權利^①。為此，社會主義的法權關係應該保障勞動產權和資本產權的平等地位。這樣，不管企業所有權的起點是公有還是私有，勞動者擁有企業生產資料的份額都會穩步增加。經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種(主要以所有勞動者對生產資料擁有個人份額形式出現的)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這種社會所有制，與國有制相比，有種種優越性。特別是，它將削弱國家主義的經濟基礎，使權力異化在經濟上成為不可能。也就是說，以勞動產權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以勞資合作的形式，實現社會經濟權力從資產階級和國家官僚手裏回歸社會所有的理想。

現在的問題是，在當前中國，有沒有超越社會民主主義、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的現實可能呢？考慮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革命傳統，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發展，斷然排除這一可能，似乎有點過於武斷。

在當前中國，有沒有超越社會民主主義、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的現實可能？考慮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革命傳統，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發展，斷然排除這一可能，似乎有點過於武斷。

註釋

①⑥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頁1-8；5。

② 丁寧寧：〈「勞動(力)產權」難以作為理論創新的出發點〉，載曹天予主編：《勞動產權與中國模式：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挑戰中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272。

③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造福人民。但以人為本的實際內容，往往局限於對住房、醫療和教育等人們的直接利益表示關心，而對於工農大眾的根本的階級利益（勞動權和不受剝削壓迫的平等權利等），則隻字不提，因而並不構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性挑戰。

④ 指只有先補上必經的但被人為地跳過的資本主義階段的課，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⑥ 引自笑蜀：〈「總起來看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李銳談社會主義與中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頁12-13。

⑦ 參見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⑧ 西方學界中還有後現代派，把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稱為現代派而加以反對。但其矛頭主要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階級觀和目的論的歷史進步觀，對於馬克思主義在學界影響的衰落有點影響；但對於自由主義，特別是體現在全球化話語中的新自由主義，後現代派可以說是毫無影響力。

⑨ 按照理性選擇理論，不存在從個人偏好形成集體利益的理性過程。參見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⑩ 對於這裏所說的「解放了生產力」，應該做些保留。從生產力的外部(物質)指標(即產值)來看，改革確實解放了生產力。但若着眼於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即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則進步並不太大。因此，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贏家，首先是控制着知識產權的跨國資本，其次是與加工出口有關的各類資本，而真正提供內需、出賣血汗的勞動者，則所得無幾。這是改革的一個極大悖論；長遠來看，也是一個嚴重的隱患。

⑪ 科學發展觀在理論上較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能否落實，則取決於抵抗發展主義的決心和能力：沒有高速的經濟發展，在當前中國這樣高度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如何支撐某種程度的「購買社會和平」，是個極為棘手的問題。

⑫ 主要指承認現有的權力和財富分配格局前提下的公平，而不是指在社會平等意義下的公平，或社會主義的公平(每個人有參加勞動、不受剝削、享受自己勞動成果的平等權利)。這種公平的實現，其主要作用，只能是合法化並進一步強化現有的權力和財富的分配格局(其一端是壟斷財富和權力的精英聯盟，另一端是億萬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僱傭勞動者)。

⑬ 作為憲政民主、人權保障、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等目標基礎的勞資合作，是市場社會存在的前提條件。但是，換旗派不是把勞資雙方在經濟地位平等條件下的鬥爭，而是把資本主義本身，誤認為是勞資合作的基礎；而把對資本主義制度固有惡果的消除，寄希望於基於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他們看不到這種機制存在的本身就取決於工人階級有效的階級鬥爭。

⑭ 據南方網2007年10月15日報導：「網友對十七大最關心的幾個問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對權力進行監督和有效的制約。第一大類的問題是反腐敗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參見〈南方網連線十七大：侯惠勤解讀十七大報告〉，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07-10/15/content_1580824_4.htm。

⑮ 這是1983年清污運動的主題。

⑯ 應該指出，使剝削成為可能的是僱傭勞動制，而不是資本本身。僱傭勞動制是以政府暴力為後盾的一種特定的法權關係。在另外一種政治權力的安排下，在另外一種法權關係中，如果工人可以租用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資本家只能拿到租金，而利潤則全歸工人所有，那麼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或在市場經濟中出現的資本產權，就不會導致剝削。

曹天予 目前在波士頓大學哲學系任教，主編《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